

“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 实践、创新与价值

董雪兵¹, 孟顺杰², 辛越优¹

(1. 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58; 2.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摘要:“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关键词:“山海协作”;共同富裕;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结对帮扶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22)05-0111-12

DOI:10.14134/j.cnki.cn33-1337/c.2022.05.010

一、引言

缩小区域差距、增强发展协同性,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路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进步与社会分工持续细化,使得资源在不同空间的流动与配置更加频繁,由此导致不同地理空间的经济差异性急剧扩大。为缩小区域差距,国家组织与安排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输送资金、人才、项目等方式进行帮扶,为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注入强大活力。然而,在实践过程中,发达地区的帮扶行为更多表现出一种政治责任与义务^[1],忽略对市场潜力的激发与培育,由此导致欠发达地区市场动力缺失,对欠发达地区发展成效产生影响。同时,发达地区的帮扶行为

收稿日期:2022-06-20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工程重大项目“浙江省改革开放45周年的回顾与展望”(22WH11ZD);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工程重点项目“从‘八八战略’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战略探索”(22WH11-1Z);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科研发展专项资助(S20220206)

作者简介:董雪兵,男,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发展经济与法经济研究;孟顺杰,男,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研究;辛越优(通讯作者),男,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浙江大学中国西部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经济与管理研究。

注重改善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忽视人民自我发展动力^[2],导致欠发达地区“等靠要”依赖性强化与自我发展能力丧失,进而影响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实现进程。对此,尽管有部分学者基于中国实践去探究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实现机制,包括中国特色对口支援实践、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政策支持、少数民族地区非遗技能开发等^[3-5],但如何在外部帮扶中形成双向互动、互利共惠的发展理论依然缺乏统一的分析框架。

2021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明确指出示范区建设要“坚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问题为主攻方向”,寄望于浙江省区域协调发展实践为破解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提供经验借鉴。作为浙江省探索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实践探索^[6]，“山海协作”充分发挥政府协调职能与市场配置资源职能,构建多渠道、多方位、多层次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在区域双向互动发展中实现欠发达地区内源式发展,有力推动了海岛、山区、老区等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浙江实践。因此,在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中,基于浙江实践深入研究“山海协作”发展历程与演进特征,剖析其推进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的内在机理,对于促进全国范围内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稳妥解决世界性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二、“山海协作”的实践历程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富有前瞻性地提出“省内沿海较发达县(市)、山区县(市)和个别经济较落后的山区县差异化发展道路”的战略构想,为念好“山海经”指明了发展道路。在浙江工作时期,习近平同志立足“山海并立”的自然条件,从促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与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全局高度,大力推进“山海协作”,其中“山”主要指以浙西南山区为主的欠发达地区,“海”主要指沿海发达地区。从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运动出发,在社会制度稳定条件下,产业发展水平是生产力水平的集中表现,而生产关系主要体现为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内部矛盾,即人民群众发展需求与社会生产供给之间的矛盾。当社会生产供给能力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发展需求时,两者之间的矛盾将会牵引生产力向更高水平迈进。从实践历程来看,欠发达地区的核心矛盾从人的基本发展需求与产业扩规增容夯基之间的矛盾,到人的能力发展需求与产业集聚协同共进之间的矛盾,最后转为促进人的共富发展需求与产业高质量特色引领之间的矛盾。与此对应,欠发达地区发展角色也发生阶段性变革:从“外部受援”获益者角色,到“合作共建”参与者角色,最后到“双向驱动”主导者角色(见图1)。

(一)“外部受援”获益者:“山海协作”开启实施阶段

相较于沿海发达地区,由于经济上的地理因素加大了物流、交通等成本,浙江海岛、山区、老区等欠发达地区产业集聚成本畸高,生产力水平低下引致社会生产无法满足人最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毋庸置疑,大力发展产业以满足人的现实发展需要依然是欠发达地区发展的第一要务,这集中表现为人的基本发展需求与产业扩规增容夯基之间的矛盾。在该阶段,“山海协作”通过促进双方资源要素整合,不仅为发达地区产业发展拓宽了空间、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还为欠发达地区人民改善条件、提高收入水平带来了机遇,在“转移型互动”发展中满足人的基本发展需要。

交通基础设施是组合利用欠发达地区土地、环境要素优势与发达地区资金、技术、人才要素优势的催化剂,是推动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的社会先行资本,已被证实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7-9]。为此,浙江省委、省政府统筹协调省内资源,正式印发《浙江省“五大百亿”工程实施计划》

等一系列文件,明确省内结对帮扶关系(见表1),加快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资源的区域间共享与扩面。通过对双方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相似的产业进行匹配,“山海协作”把推进欠发达地区产业培育和企业扶持有机统一起来,不仅引导发达地区企业到欠发达地区投资设厂,帮助欠发达地区引进项目、引进资金,还要求发达地区帮助解决项目建成后的技术开放、市场扩展与管理运营等具体问题。同时,基于欠发达地区生态屏障功能属性,产业合作对象大力鼓励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环境友好型产业,限制资源高消耗、污染物高排放的工业企业向欠发达地区扩散。此外,2006年启动“科技富民强县专项行动”、推广省级科技特派员制度,以做强县域特色优势产业为切入点进一步加大产业帮扶力度。“十一五”期间,“山海协作”累计签订山海协作特色产业项目6329个,到位资金1415亿元,财政转移支付1135亿元,年均增长28.6%^{[10]46-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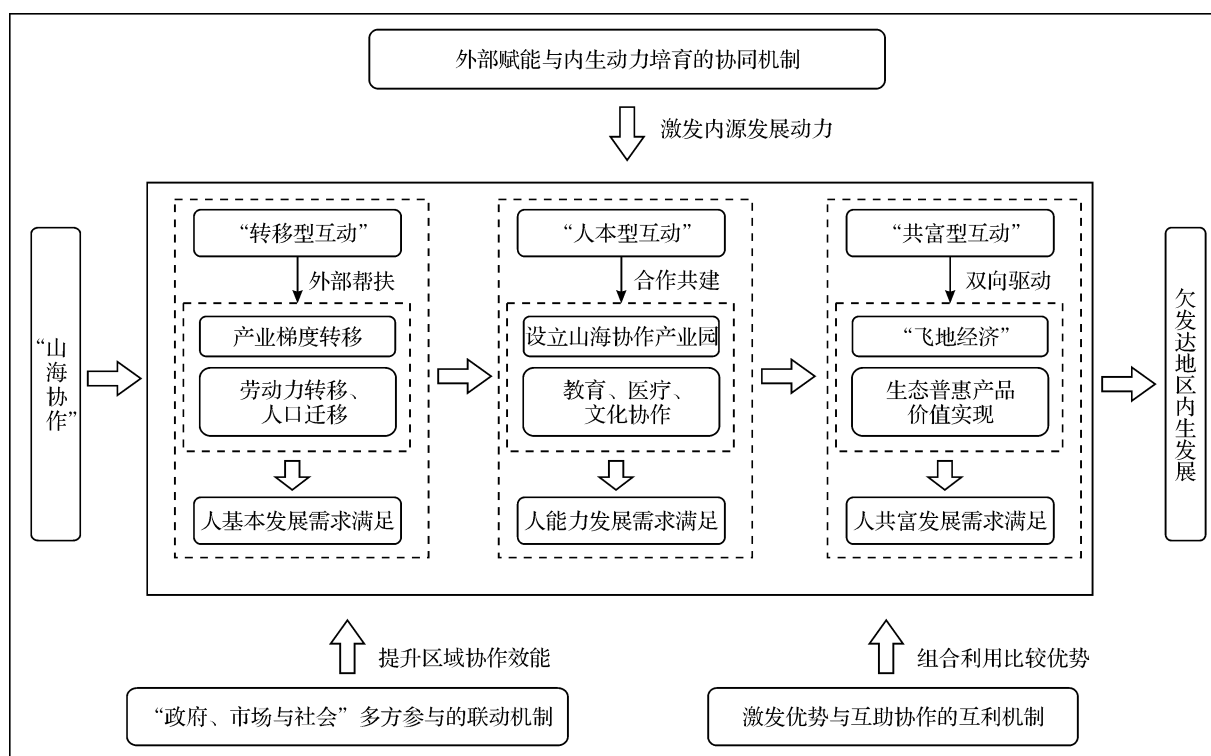


图1 “山海协作”推动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的逻辑框架

“山海协作”发挥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要素富集优势,加速劳动力转移与人口迁移,为提高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奠定坚实基础。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欠发达地区发展要综合运用“加减乘除法”,其中“除法,即促进人口向城市集聚和对外转移”^[11]。具体而言,通过安排专项用地指标,依托县城、中心城镇与各类产业园,推动生态功能区、高山深山、流域源头等不适宜经济活动开发的特殊地区人口向县城、中心镇集聚或向外迁出转移,实现下山脱贫、劳务输出、生态保护与产业布局的“四位一体”优化。同时,“山海协作”举办包括设立山海协作专区、山海协作馆等在内的交流活动,激发欠发达地区市场活力,并为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积极提供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良好的就业服务,促进用工需求和劳务输出的有效对接,以劳务输出的方式进一步加快欠发达地区农户脱贫致富,推动区域经济布局优化。“十一五”期间,浙江省完成下山搬迁10.3万户、37.2万人,组织劳务培训28万人次,转移就业53万人。此外,2000—2010年,欠发达地区农民工资性收入由959元上升为3624元、非农收入由

3499元上升为5113元、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由409元上升为767元^{[10]82-84}。

表1 “山海协作”关于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对口协作安排

对口市	对口县
杭州市、绍兴市—衢州市	萧山区—淳安县 余杭区—衢江区 富阳市—龙游县 绍兴县—江山市 上虞市—衢江区 诸暨市—开化县 嵊州市—常山县
金华市内对口	义乌市、东阳市、永康市—磐安县 东阳市—武义县
宁波市、嘉兴市、湖州市—丽水市、舟山市	鄞州区—景宁县 慈溪市、平湖市—青田县 余姚市—松阳县 桐乡市—遂昌县 海盐县—龙泉市 海宁市—莲都区 德清县—缙云县 长兴县—庆元县 宁波经济开发区、北仑区—云和县 镇海区—定海区 象山县—岱山县 海曙区—普陀区 奉化市—嵊泗县
温州市内对口	瑞安市—文成县 乐清市、鹿城区—泰顺县 瓯海区—永嘉县 龙湾区—苍南县
台州市内对口	玉环市—仙居县 温岭市—三门县 市级机关—天台县

(二) “合作共建”参与者：“山海协作”深化发展阶段

伴随着欠发达地区人民基本现实发展需求得到满足,他们进一步追求高质量的文化水平、医疗卫生与技术能力来促进个人能力的全面发展,而欠发达地区在社会事业发展方面依然处在低水平状态,以医疗卫生为例,2009年山区县土地面积占比81.44%,而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医生数分别为71189张、54011人,仅分别占全省的44.14%和48.18%^{[10]335-336}。由此,欠发达地区内部矛盾也转化为人的能力发展需求与社会产业协同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阶段,“山海协作”通过共建山海协作产业园与积极开展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协作,不仅为发达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空间,还为欠发达地区人民激发自我发展动力夯实了基础,在“人本型互动”发展中实现人的能力发展需求满足。

一方面,缩小民生事业差距、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激发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潜力。2009年浙江省发布《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新一轮“山海协作”工程的若干意见》,着力在基本公共服务和低收入群众增收两个方面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全面开展教育事业、卫生事业与文化事业的“山海协作”。在此阶段,浙江省继续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来改善欠发达地区医疗卫生、教育等基础设施水平,实行发达地区干部、教师和医务工作者到欠发达地区、革命老区任职工作或轮换下派制度,采取多种形式为欠发达地区和老区提供人才、智力支持。同时,通过鼓励、引导与推动,政府促使省直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从科技、教育、卫生等方面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此外,“山海协作”广泛联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产业、就业等方面协作,协同培养劳动力的文化水平与技术能力,不仅增强了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自身发展能力,还为发达地区带来了高质量的劳动力资源。

另一方面,设立山海协作产业园,实现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产业协作层次与水平提升。山海协作产业园是由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双方政府“共同管理、共同投资、共同招商、共同受益”的发展模式,是双方开展产业协作的有效形式。通过建立与发达地区开发区、园区结对合作机制,山海协作产业园为欠发达地区加快与经济强县在制度、产业、科技、服务等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平台,进一步优

化欠发达地区投资环境。同时,双方按一定比例分成项目投产后新增的增值税、所得税地方留成部分,欠发达地区在耕地占补平衡上给发达地区提供土地指标,使得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形成利益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山海协作产业园为欠发达地区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有力地促进了农民素质培养、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开发。

截至2015年,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取得明显突破,各县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户,率先实现脱贫攻坚,并不再称山区26县为欠发达县(市、区),代之以“加快发展县”,即将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三)“双向驱动”主导者:“山海协作”高质量发展阶段

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作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论断。因此,唯有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12],才能推动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即促进人的共富发展需求与产业高质量特色引领之间的矛盾。在此阶段,“山海协作”以增值生态资本、育强生态产业等方式普惠“山”“海”人民福祉,同时通过“飞地经济”推动区域经济合作迈向更高层级,在“共富型互动”发展中实现人的共富发展需求满足。

一方面,绿色发展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环境需要的内在要求,必须以加快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驱动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等生态资源既是山区发展的比较优势,也是山区发展的潜在发展优势,更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首先,“山海协作”定位“高效生态、特色精品农业”,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公用品牌、企业品牌和特色农产品品牌,如“仙居杨梅”“遂昌菊米”等。其次,借助“山海协作”,山区26县加快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走高技术含量、低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的发展道路,发展生态工业。最后,立足山区26县拥有的旅游资源,“山海协作”以生态旅游业作为联动一二三产业发展的纽带,推动民俗旅游、农家乐旅游、休闲度假旅游等生态旅游业蓬勃发展,为“山”“海”人民带来最普惠的绿色福祉。

另一方面,加快经济发展依然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手段,必须以创新“飞地经济”^①推动产业高质量协作。浙江省陆续出台《关于促进山海协作“飞地经济”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等多项政策,支持山区26县到省内发达地区投资建设“产业飞地”、“科创飞地”与“消薄飞地”,推进“山海协作”向更宽领域、更高层次提升。其一,由省委省政府统筹安排,在浙江大湾区、省级高能级平台等相关产业发展平台,为山区各县布局以先进制造业为主的“产业飞地”。其二,通过采用“在外研发+本地制造”模式,“科创飞地”为欠发达地区有效吸纳人才、资本、技术等创新要素、搭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和产业化提供有效平台,打通科技人才项目“飞入地”孵化与“飞出地”产业化联动发展的通道。其三,“消薄飞地”以帮助带动低收入农户增能增收和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为目标,助力“飞地”发展物业经济、楼宇经济等,为集体经济薄弱村实现“消薄”提供有效保障。截至2020年,浙西南山区市县通过“山海协作”累计获得援助资金超百亿元,建设山海协作“飞地”园区42个。其中,30个“消薄飞地”建设带动2500多个集体经济薄弱村“消薄”实现增收,返利2亿多元^[13]。

^①“飞地经济”是指相关行政地区在平等协商、自愿合作的基础上,打破区划限制,以生产要素的互补和高效利用为直接目的,在特定区域合作建设、开发各种园区平台,实现互利共赢的区域合作发展模式。

三、“山海协作”的基本特征

回溯“山海协作”实践历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内核,协同发挥政府与市场双重作用,通过两地资源、人才、技术等要素流动、整合,实现区域优势互补、联动发展,是“山海协作”促进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双向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 以人民为中心是“山海协作”的主体动力

人始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最活跃的源泉,既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实质,是要最大限度地创造机会公平,促进各地区人民的收入水平、生活质量与幸福指数不断提高,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山海协作”最根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体现就是实现区域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最核心的思想在于推进以人为中心的协同发展^[14]⁹⁴。具体而言,“山海协作”从多维度缩小区域差距、群体差距,不仅以社会救助、产业梯度转移、财政转移等“授之以鱼”的方式,解决欠发达地区低收入群体的物质方面的“燃眉之急”,而且以职业教育、卫生医疗全方位协作等“授之以渔”方式,培育和提升欠发达地区发展主体的人力资本水平,以区域协调发展为目标切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与幸福指数。

(二) 激发比较优势是“山海协作”的基本逻辑

自然地理是经济地理的首要约束,经济地理和资源禀赋则为理解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科学性提供了基本面。理论与实践充分证明,欠发达地区必须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实现赶超发展、跨越发展。对此,通过加大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工程建设与外部市场帮扶,“山海协作”积极拓宽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结对帮扶领域,积极探索欠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途径,为激发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打下坚实的基础。通过挖掘地域特色,“山海协作”对生态产品进行整体设计、对品牌产品进行质量管控,建立多层次的生态产品体系,在讲述品牌故事中增值生态资本。同时,海岛欠发达地区依托海洋资源优势,重点推进港口开发、临港工业、海洋渔业、滨海旅游业等领域经济活动,做大做强海洋经济。此外,“山海协作”通过人口内聚外迁、签订劳务合同等方式,推动劳动力资源合理流动,优化地区间人口布局,激发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资源优势。

(三) 协同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是“山海协作”的根本保障

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公平”与“效率”兼顾的过程,既要发挥政府总揽全局的能动作用,也要发挥市场在提升经济运行质量、效率与动力的重要作用^[15],实现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两个作用的有机统一。构建基于优势互补、互利双赢、要素流动的发展机制,在市场合作中实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互利共赢,是“山海协作”提升双边合作效能、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根本保障。一方面,“山海协作”发挥政府先行撬动、引导作用,以财政转移支付、对口互助等方式,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对欠发达地区投资项目资金、人才等方面给予支持,引导广大社会资金加入协作项目建设,以战略统筹的科学路径来实现欠发达地区约束的破除与适应。另一方面,在推进产业梯度转移承接时,“山海协作”坚持市场化、互利化方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结对帮扶,以共建产业园、飞地经济等方式发挥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比较优势,形成两地市场竞争能力共建、市场效益共享的互利共赢发展新格局。

(四) 动态效率优化是“山海协作”的发展导向

优化区域经济格局、提升区域发展整体效率,是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协同发展的关键。因此,任何离开区域统筹发展的经济活动都会损失区域整体发展的效率与进度,违背区域高质量

发展的基本逻辑^{[14]130}。总体而言,“山海协作”不仅在时间维度上遵循渐进协调、螺旋上升的动态演进规律,而且在空间维度上秉持重点区域优先发展、以重点区域带动整体协调发展的发展旨向。通过加强地区间互利合作、互助协作与联动发展,“山海协作”将欠发达地区拥有的水土资源优势、自然资源优势、人力优势与发达地区的人、财、技术优势相结合,推动产业向欠发达地区梯次联动,促进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有序转移,加速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区域的协作与交流,实现了经济布局优化战略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有机统一,在互利共赢中推动整体动态效率优化。

四、“山海协作”的理论创新

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与培育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处理好自身发展能力与外部推力的关系^{[14]1},在动态发展中推动发展相对平衡与绝对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实现更加充分和更加均衡的发展。然而,由于双方利益的非均衡性与帮扶行为的既定性,发达地区在帮扶过程中无法与欠发达地区形成紧密联系、双向发展的耦合关系,缺乏对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培育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基于对“山海协作”演进历程与基本特征的全面把握,本文提出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以构建要素充分流动、产业梯次转移与经济多维合作的区域协作模式为核心,在区域双向互动发展中实现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的区域发展理论。这一理论既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援助”、“市场主体”与“增长范式”的逻辑超越,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具有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具体内涵从如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 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

如何消除贫困、实现协调发展,是包括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在西方“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叙述中,资本的趋利属性势必导致社会财富生产与分配失衡,造成不同主体等级差别^[16],其结果必然导致“资本逻辑”凌驾于“人本逻辑”之上,不可避免地带来贫富的“两极分化”。为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财政转移、设施捐助等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援助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但从本质而言,“输血式”外部帮扶更加注重钱、项目等物质输送,无法将解决根本性贫困思维内嵌于整体经济发展框架,忽视了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的重要性,缺乏推动欠发达地区自我能力塑造与提升的内生机制,导致欠发达地区“等靠要”依赖性强化与自力更生能力缺失。换言之,唯有具备内源动力与自我发展动力,才能持续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

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教育、文化、医疗等方面的帮扶与协作,发挥人力资本增进效应,是充分调动欠发达地区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关键。诚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上所述,“要激发内生动力,调动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积极性”^[17]。从实践视角审视,“山海协作”具有鲜明的人民属性,它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升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欠发达地区人民发展需求,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教育文化水平与综合技能水平,缩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人民之间的精神差距、能力差距与动力差距,在外部赋能中培育欠发达地区内生发展动力。由是观之,“山海协作”通过提升欠发达地区人民自主发展能力突破长期以来治标不治本“输血式”外部帮扶的发展桎梏,不仅是区别于常规对口协作、国际援助等举措的鲜明特征,也是对西方“发展援助”思维导向的超越。

(二) “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

西方减贫理论强调市场经济的重要意义,认为即使没有政府政策干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也会自动在社会各阶层扩散开来,增长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途径^[18-20],也即“涓滴效应”。然而,

在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由社会整体增长所带来的资源或利益具有“亲资本”或“亲富人”属性,对弱势群体的“涓滴”作用十分缓慢,使得弱势群体处在长期的贫困陷阱之中^[21]。事实上,由于市场规模较小、市场机制不完善,欠发达地区缺乏技术进步与社会分工的持续增长动力,无法通过市场力量实现内生增长。同时,若不加以政策干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往往会自我强化,形成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进而影响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安全稳定。质言之,在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的进程中,政府作用不可或缺。此外,社会组织能够在提供社会服务、构造国家与社会关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2-23],积极配合市场与政府实现最优的发展成效。

从组织构成和参与主体角度审视,“山海协作”在实践中形成了“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联动机制,不仅是扶贫开发与区域对口协作发展模式的创新,还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主体”运行逻辑的超越。一是“山海协作”发挥政府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协调等方面的作用,统筹协调省内省外优势资源,有效改善了欠发达地区制度环境与基础条件。二是“山海协作”强调运用市场机制,在市场化产业转移与项目对接的过程中,培育欠发达地区市场潜在动力,发挥市场配置优化与效率增进的优势。三是“山海协作”通过社会组织力量提升欠发达地区人口技能水平、文化教育素质等自我发展水平,发挥社会组织技术带动优势、专业化优势。在“政府、市场与社会”相互支撑的联动框架下,“山海协作”推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在有效市场中持续合作、良性互动发展,从根本上切实破除欠发达地区因自然因素或社会因素的返贫机制,在提升整体效率中实现协调发展、充分发展与动态发展。

(三) 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的互利机制

找准比较优势、促进互助协作,是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互利共惠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也是实现欠发达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基于主观效用的功利主义价值观^[24],割裂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平衡。在资本利润驱使下,资本内在的剥削性与趋利性催生出以经济增长为内核的强大意识形态,形成发展为了经济发展、成功为了经济成功、价值为了经济价值的社会增长范式。所谓“区域协作”的发展路径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维护阶级利益的手段方式,其根本原因在于掩盖资本积累与资本增值的非正义性,双向互利发展的持续性与积极性,不可避免地造成贫富差距扩大。同时,经济理性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绝不会将经济发展让位于自然理性占主导地位的现代化发展,通过不计后果地开发与攫取生态资源来宣告“征服自然”的胜利,不可避免地造成生态危机。很显然,区域协调发展是一个渐进协调、动态协调的过程,必须要在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分工与协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优势互补与良性发展。

从实践历程来看,“山海协作”在厚植与巩固原有禀赋优势的基础上强化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经济合作与市场联系,塑造以发挥比较优势为基点、以促进区域优势互补为路径的双向互动发展格局。具体而言,一方面,立足沿海地区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山海协作”扩大温台沿海、环杭州湾等经济发达地区向浙西南城市经济辐射和产业梯度转移,向欠发达地区输送人才、产业等要素,形成技术溢出效应、创新联动效应。另一方面,立足欠发达地区生态资源、劳动力优势,“山海协作”高度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与保护,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生态资源有序开发,为发达地区带来普惠的生态产品。在“山”“海”协同发展驱动下,“山海协作”在区域协作中提升整体发展效率,走出一条科学持续、互利互惠的发展路子。

五、“山海协作”的价值意蕴

认识的本质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的能动反应,总结实践经验是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从实践脉络

来看,“山海协作”突破西方“以增长带均衡”的发展范式,竭力化解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的发展导向、发展动力与发展路径约束,展现出哲学思维的变革伟力与创新发展的理论魄力,为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丰富、共同富裕实现与世界贫困问题破解提供了全新的理论智慧与实践经验。

(一) 丰富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发展的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事物发展的有机整体。”当各发展要素之间的不协调性持续积累,发展就会因为失去平衡而止步不前。唯有强调协调好各发展因素之间关系、提升整体效能,才能转变和化解长期积累的失衡矛盾。国际历史经验深刻表明,以“资本逻辑”为根本依循、以“少数阶级”为利益核心的发展模式,将会产生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25],不仅影响经济的正常循环,而且会导致社会阶层固化、社会动荡不安、民族主义抬头等尖锐的社会矛盾。

从国内发展视角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必须适应新形势,谋划区域协调发展新思路”“要面向第二个百年目标,作些战略性考虑”,把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作为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不断将理论与实践统一构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然而,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经济与社会、经济与生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等多重发展矛盾之中。因此,构建更高水准、更高质量与更可持续的区域协调发展大格局,不仅是回应中国发展“时代之问”的实践答复,还是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人类社会生存、发展与价值的理论旨趣。从总体上来看,浙江样本与中国所面临的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问题具有相似性。“山海协作”以产业梯度转移与劳动力有序转移等方式构建宽领域、多层次、全方位的合作交流格局,促进了不同等级、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与效率增进,走出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协调、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协调的良性互动发展新道路,对全国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二) 助推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与路径

实现“山”“海”全体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是“山海协作”最根本的利益诉求和价值体现,这一理念也与共同富裕的目标高度契合。从历史的维度审视,从建党之初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来建立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进行的革命求富求强,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走工业化道路而进行的工业求富求强,再到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而进行的改革求富求强,最后到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经济发展动能弱化、国际挑战日益加剧而进行的发展求富求强^[26]，“国强”且“民富”思想是在波澜壮阔的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中贯穿始终的主题主线。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的显著标志,自始至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孜孜以求的国家愿景目标,是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此外,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实现覆盖14亿人口的共同富裕将会彻底改写现代化世界版图,对人类发展历史产生深远影响^[27]。

我们要深刻知晓,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促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系统工程,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要通过先富帮后富、发达地区帮扶欠发达地区来实现逐步共富,也要通过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一体推进、满足人民日益丰富的物质文化需求来实现全面共富,更要通过全体人民脚踏实地、共同努力来实现共建共富。“山海协作”实践经验证明,唯有将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山”“海”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围绕贫困村、贫困户如何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开展政策制定,不断补齐欠发达地区发展短板和改善民生条件,才能使欠发达地区人民真正享受更多、更公平、更实在的发展成果,才能最大程度提升民生福祉的全面性与全民性。“消除贫

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28]。在此意义上,“山海协作”实践不仅是浙江省未来发展的基本路向,还是创造更加富足美好生活国家愿景的有益示范路径。

(三) 提供解决世界贫困的智慧与方略

“山海协作”为政府在解决世界贫困难题的作用提供了新的理解视角。对于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存在争议:包括基于古典经济学的“守夜型政府”、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规制型政府”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型政府”^[29]。然而,根植于西方经济理论基础的经济学派,无法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能够帮助发展、解决贫困、实现现代化的综合性框架^[30]。从实践发展脉络来看,“山海协作”以内源发展与外部帮扶相结合,建构“政府搭台、市场运作、各方参与”的双向开放发展平台,让“山”“海”激发“联姻”的主动性、积极性,实现协作的长期效力。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31],既要最大程度发挥市场优化资源的配置效率,又要通过政府实现经济发展的特定目标,提出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的科学论断,这是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所不曾有的发展模式。从这一高度来看,“山海协作”实践不仅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源头活水”,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处理政府市场关系的有益发展视角。

“山海协作”为解决贫困问题的动力机制提供了新的科学思维。贫困落后的国家如何摆脱贫困,实现工业化,最终走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发展经济学的重点研究问题。作为世界脱贫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用短短70多年的实践,高效推动经济发展并保持社会长期稳定,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百年甚至数百年发展的水平,在2020年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与区域贫困问题^[32]。这一成功实践无疑向世界宣告西方发展模式的弊端,资本逻辑、贫富两极分化不是未来发展的趋向。“山海协作”能够推动“山”“海”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共同富裕,离不开对欠发达地区内部矛盾因素的精准把握,以破除欠发达地区的阶段性内部矛盾约束实现双向良性互动发展。当然,基于欠发达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地质灾害频发等自然灾害因素,加之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水平薄弱、教育水平不高等社会因素,脱贫的地区经济造血功能不强,依然存在返贫困的潜在风险。总括而言,唯有从地区发展内因出发,充分调动欠发达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积极性,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才能切实突破贫困的生成机制,才能为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提供可持续的内生发展动力。

六、结 语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其核心在于缩小区域差距、收入差距与城乡差距“三大差距”,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生活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人均财政支出等方面的不平衡现象依然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一定时间内仍将长期存在。毋庸置疑,实现共同富裕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与复杂性的系统工程,不能要求所有地区、所有人群达到同步富裕、同等富裕,必须在做大蛋糕的过程中寻找出一条兼具平衡性与包容性的高质量发展路径,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因此,就区域发展视角而言,发达地区帮扶欠发达地区、实现各地区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任务仍将长期存在。

实践是理论之源,理论是实践之果,总结提炼正确的实践经验是任何科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山海协作”紧密结合浙江省情和发展阶段特征,以省域内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结对帮扶为主要方

式,围绕“人的发展”与“产业发展”的互动辩证主线,通过实施系列重大工程项目、构建互利共赢机制、打造资源共享平台等途径,促进了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区域之间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构建了具有中国实践特色与世界意义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其中,“山海协作”以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相结合,高度重视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技能培训等方面协作,提升欠发达地区人民的自主发展能力,为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理念;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增进作用与社会组织补充作用,在市场化机制中促进各类要素自由、高效地流动,为区域协同发展提供新路径;重视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组合利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各自比较优势,为区域双向发展提供了新方案。总括而言,“山海协作”的成功实践,是市场与政府相互配合、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短期利益与长远目标相互贯通、全面规划与突出重点相互协调的必然结果,丰富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参考模式与践行路径,为解决世界性贫困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与方略。

参考文献:

- [1]周晓丽,马晓东.协作治理模式:从“对口支援”到“协作发展”[J].南京社会科学,2012(9):67-73.
- [2]刘义圣,许彩玲.习近平反贫困思想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借鉴[J].东南学术,2016(2):1-9.
- [3]郭丹丹,苏昕.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治理的逻辑与机制[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1(5):93-106.
- [4]龚斌磊,张启正,袁菱苒,等.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创新与效果评估[J].管理世界,2022(8):26-43.
- [5]黄伟,唐余宽.制度诱制型跨越式发展:破解发展悖论的战略选择[J].贵州财经大学学报,2020(6):57-63.
- [6]刘缉川.从“山海协作”工程到“一带一路”[J].浙江社会科学,2016(1):15-17.
- [7]刘生龙,胡鞍钢.交通基础设施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J].经济研究,2011(3):72-82.
- [8]DONALDSON D,HORNBECK R.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A “Market Access” Approach[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6,131(2):799-858.
- [9]杨远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乡村振兴研究[J].东岳论丛,2020,41(03):37-49.
- [10]李学忠.加快山区经济社会发展 促进陆海联动区域协调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46-336.
- [11]习近平.之江新语[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94.
- [1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001).
- [13]李中文,窦瀚洋,刘书文.浙江:山海协作升级[N].人民日报,2021-08-02(001).
- [14]董雪兵.山海协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94-130.
- [15]卢福财,王守坤.历史脉络与实践视野下的有为政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命题[J].管理世界,2021(9):77-90.
- [16]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J].中国社会科学,2018(7):4-21.
- [17]本书编写组.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37.
- [18]周华.益贫式增长的定义、度量与策略研究——文献回顾[J].管理世界,2008(4):160-166.
- [19]PARR J B. Growth-pole Strategies in Regional Economic Planning: A Retrospective View: Part 1. Origins and Advocacy [J]. Urban Studies, 1999, 36(7): 1195-1215.
- [20]DOLLAR D,KRAAY A. Growth is Good for the Poor[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2002, 7(3): 195-225.
- [21]杨灿明.中国战胜农村贫困的百年实践探索与理论创新[J].管理世界,2021(11):1-15.
- [22]文军.中国社会组织发展的角色困境及其出路[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2(1):57-61.
- [23]纪莺莺.当代中国的社会组织:理论视角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3(5):219-241.
- [24]刘煜,朱成全.回到马克思:生态经济学的偏废与重塑[J].经济学家,2022(3):13-24.
- [25]罗红杰.中国式现代化的百年实践、超越逻辑及其世界意义[J].经济学家,2021(12):5-13.
- [26]黄茂兴,叶琪.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国强民富”思想的理论嬗变与实践探索[J].管理世界,2021(11):15-25.
- [27]刘培林,钱滔,黄先海,等.共同富裕的内涵、实现路径与测度方法[J].管理世界,2021(8):117-129.
- [2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189.

- [29]黄先海,宋学印. 赋能型政府——新一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建构[J]. 管理世界,2021(11):41-55.
- [30]林毅夫. 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 经济学(季刊),2011(1):1-32.
-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50.
- [32]王大明. 中国共产党减贫的实践历程、基本经验及未来转向[J]. 经济学家,2021(7):17-26.

Practice, Innovation and Value of “Mountain and Sea Collaboration” Project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DONG Xuebing¹, MENG Shunjie², XIN Yueyou¹

(1. Research Center for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Mountain and Sea Collaboration” is one of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Xi Jinping’s important thesis on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which aims to promote synergistic cooperation and common development of the developed regions and less developed regions, and is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Zhejiang to promote the reduction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In practice, the “Mountain and Sea Collaboration” has broken through the Western “capital logic” assistance model and built a “human logic” assistance model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socialist system. The “Mountain and Sea Collaboration” emphasizes stimulating the vitality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the “community” of helping and being helped, and forms regional two-way-driv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containing the synergistic mechanism of external empowerment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ower cultivation, the interactive mechanism of “government, market and society”, and the mechanism of stimulating advantages and mutual benefits of mutual as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which enriches the innovative theory of China’s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mmon prosperity practice.

Key words: “Mountain and Sea Collaboration”; common prosperity; regional two-way-driv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theory; twinning support



(责任编辑 孙 豪)